

力結構、及國民黨對於反對運動的長期的鎮壓措施，都是造成激進派系的觀點及運動策略，在反對陣營中漸漸取得優勢的主要原因。

在〈族群同化與動員：台灣民眾政黨支持之分析〉一文中，本人則由微視層次的資料，討論台灣省籍族群區分與政治變遷糾結的另一面向：所謂的省籍融合與本省人政治動員之間的關係。由於在一九九二年以前，絕大多數的外省籍民眾都在選舉中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而不支持反對運動，而本省籍民眾則有相當比例支持民進黨。這篇論文的研究問題因此是：本省籍民眾為何支持國民黨或支持民進黨？前一篇論文主要是分析反對運動對民眾進行共識動員的努力，本文則企圖進一步分析：這些運動的努力是否成功的吸引了其目標支持者？它吸引了那一種社會背景的本省籍民眾？為什麼？運用了「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資料進行分析後，本文發現，本省籍民眾之中，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國語較流利、與外省人通婚者，較可能支持國民黨。反之，自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內婚者，比較可能支持民進黨。文中的重要結論是：過去執政黨強勢的族群同化政策之成效，明顯的增加了本省籍民眾支持國民黨的可能性，也降低本省籍民眾被反對運動族群動員訴求吸引的可能性。它因此呼應了前一篇論文的發現。

王甫昌

學經歷：

國立中興大學社會學
學士(1980)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社

會學碩士(1986)、博士(1989)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1989-92)

本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1992-96)、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1996)、副研究員(1996-迄今)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進修(1996-97，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第三十四屆出國進修人員)

什麼是中國人？ ——華夏邊緣的形成與變遷

王明珂

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從前許多學者對於「什麼是民族」有一種看法：民族是有共同血統、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等的人群。基於這種對民族的定義，許多考古與歷史學者由歷史文獻與考古資料中蒐尋語言、體質與文化特徵等材料，由相似與相異的類比中溯源，希望由了解中國人種、語言與文化的起源來詮釋中國人的本質。六十年代末起，人類學族群現象與理論研究有革命性的發展；強調主觀認同（而非客觀特徵）與族群邊界（而非內涵）的族群定義，進而探索族群認同的工具性（利益）與根基性（情感）基礎。近年來我結合人類學族群理論與集體記憶理論，由中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與變遷來嘗試解

答「什麼是中國人」。對此一個簡單的比喻便是：當我們在紙上畫個圓形時，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它看來像個圓形。

首先，我曾研究中國黃土高原邊緣三個區域——青海河湟、內蒙古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遼西——游牧經濟形成過程。新石器時代晚期，這些地區都在仰韶與龍山文化的影響範圍之內，在人類生態上與黃河中下游地區沒有太大差別。各遺址中的大量豬骨、陶器與石製農業工具是這種農業定居生活的寫照。約在西元前2000-1000年，氣候普遍變得乾冷，對這些居於農業邊緣地區的人群造成相當打擊。在青海地區，養羊的風氣開始盛於養豬，最後豬完全被羊、馬、牛等草食動物取代。同時房屋消失，陶器愈來愈小且數量少，盛行陪葬隨身裝飾品與馬牛羊的腿骨。顯然爲了利用草食動物及其移動力以擴大對自然資源的利用，人們放棄所有不利移動的文化因素。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及套北地區，在西元前2400-1600年左右經歷一段人群間劇烈的資源競爭後，嚴酷的氣候使得所有遺址都被放棄，此後近一千年當地都少有人居。

氣候乾旱化使得適於農牧混合經濟的地區南移，約從西元前1400年起，今陝、晉、冀三省之北出現一些人群。他們更依賴畜養動物，主要是羊。爲了牧羊，他們無法在一地居留太久。另一方面爲了生存，他們經常彼此或向南方人群爭奪適於農牧之地。他們因此成爲好戰的武士，也成爲南方商人心目中野蠻的敵人。在甲骨文中，商人稱西北方或西方一支敵對人群就叫「羌」——羊人（此字由羊、人兩部分構成）。在有關周人的先秦文獻中，我們也能看到這種人類生態變化的遺跡。周人約在西元前1300年左右崛起於周原。他們自稱始

祖爲后稷（有農神之意），族人原以農業見長，後來因故放棄農業，在戎狄間遷徙流離，遷到岐山下的周原後又開始行農業、營宮室。許多學者都曾藉此記載追溯周人族源及遷徙經過。但我將它視爲一種歷史記憶：一群人強調農業與定居來表達一種認同，以別於另一些主要以非農業、不定居來獲取資源的人群。前述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黃土高原邊緣的人類生態變化，正是這種歷史記憶產生的背景。

北方黃土邊緣人群的畜牧化、移動化與武裝化，造成他們在南方人群心目中的野蠻性，並促使南方人群由西周到春秋逐漸凝聚成華夏。春秋戰國時期華夏以「內諸夏、外夷狄」來維護、爭奪資源。北方華夏諸國紛紛吞併或驅逐戎狄，並建長城爲界。華夏愈合作以維護南方資源，愈迫使北方人群游牧化。華夏形成與長城建立後，長城外的游牧世界也相應形成。從此沿著長城展開數千年資源競爭與維護的戰爭。

人類解決資源不足通常有三種辦法（或兩、三種辦法併用）。第一是改進生產技術，擴大可利用的資源。第二是，以戰爭、征服與統治將部分人變成吃得少做得多的生產者，以剝削他們來供養少數統治階級。第三是以新的族群認同劃定可分享資源的人群範圍，並以武力將其他人群排除在外。後面兩種辦法沒有增加資源，只是以暴力進行資源重分配。當黃土邊緣農民以畜養草食動物來擴大資源以因應氣候普遍乾冷化時，在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雖然改進農業技術增加生產一直在進行，但從龍山晚期以來最大的變化顯然是人群間的衝突增加，財富與權力的分配愈來愈不平均，政治結構愈來愈大。終於在西元前2100-1500年間出現了中央化的夏、商王朝。並在此後的周王

朝時代華夏與夷戎蠻狄之分的觀念形成，華夏成爲一個強力維護共同資源的人群。

華夏的凝聚則賴共同祖源記憶。在春秋戰國時，華夏各國上層家族都述說記錄祖先起源故事，如此形成紛雜的古帝王英雄傳說。在各家族與地域人群的競爭與融合中，這些古帝王英雄傳說逐漸彼此串聯起來，如帝嚳成爲商人與周人的共同祖先。到了漢代黃帝與炎帝成了所有華夏的共同始祖，也就是一個華夏源流樹的「根」。此後華夏皆以炎黃子孫的記憶彼此認同。

華夏邊緣形成後，隨著華夏的擴張華夏邊緣逐步向西、向南漂移。這包括兩個同時並進的過程：一是華夏重新定義誰是異族；二是原來的非華夏假借華夏祖源成爲華夏。第一個過程，我們可以「羌」爲例說明。「羌」有西方異族之意，可視爲商人及後來華夏的西方族群邊緣。由文獻中「羌」的人群地理指稱內涵變化，可以發現從商代到東漢這個邊緣由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逐步向甘肅的隴西、河西走廊、青海河湟西移，所過之處的人群都成了華夏。終於在漢末魏晉時它移到青藏高原東緣並從此固定。將漢晉稱「羌」的人群由北至南連成一道線，這條線便是華夏西方族群邊界；至今這條線仍是漢族與藏、彝各族間的邊界。許多學者都曾建立綿延數千年的羌族史。但我認爲「羌」並不是代代住在中國西疆的某一民族，而是代代存在華夏心中的一種對西方異族的概念。由商代到漢代隨著華夏的向西擴張，羌人的概念也向西推移。所謂羌族史，事實上是華夏邊緣向西擴張漂移的歷史。

另一個過程——邊緣人群以假借或尋得華夏祖先以成爲華夏——我們可以春秋時期江蘇南部吳國王室的華夏化爲例。中國文獻記載中

有太伯奔吳故事：周人祖先太伯爲了避位讓賢由陝西逃到蘇南，並成爲當地的王。事實上，古坳（吳）國遺址的發現，證明太伯所奔的吳可能就在陝西寶雞附近。春秋時期「太伯奔於蘇南吳國」傳說的意義是，在吳國爲華夏對抗楚國的現實背景下，華夏以「華夏祖先到蠻荒之地成爲當地的王」來將吳國王室納入華夏族群邊界之內，而吳國王室也因接受這位華夏祖先而成爲華夏。在漢代，華夏曾以箕子、徐福、莊躋等歷史傳說分別對朝鮮、日本與雲南地區的人群開放其族群邊界；是否成爲華夏端視土著是否接受華夏祖先。西方學者也曾以「東遷的巴比倫酋長即爲中國黃帝」（中國民族西來說），來企圖將中國人變成歐美人的後裔。在清末民初華夏民族挫折中，有些中國歷史學者也曾在「中國民族西來說」裡找到被遺忘的西方祖先。假借或遺忘一些祖先，這是人類族群認同與認同變遷中的普遍現象。

新石器時代晚期到商周時期，華北地區一連串的經濟生態與社會政治變遷，造成華夏與華夏邊緣的出現。由春秋到漢末，華夏邊緣向外擴張、確立。華夏的形成賴歷史記憶，華夏的擴張也造成許多原來的邊緣人群失憶與歷史記憶重塑，以加入華夏之中。從此華夏成爲東亞地區一個最大的維護共同資源的人群。

以上華夏的例子顯示，族群邊界的形成與變遷是在特定的資源競爭關係中產生，這是工具論者（instrumentalists）的觀點；族群認同是人類資源競爭工具。族群成員以共同祖源記憶來凝聚；共同祖源記憶在人群間產生模擬同胞手足之情的根本感情聯繫，因此根基論者（primordialists）的立場可得到詮釋。但作爲一種社會記憶，「共同祖源記憶」可能被扭曲、假借或遺忘，藉此個人或人群得以加入、

接納或脫離一個族群，因此造成族群邊界變遷（認同變遷）。兩個互動密切的族群，經常互相「關懷」甚至干涉對方的族源記憶。接受強勢族群給予的族源記憶，經常發生在許多少數族群之中。在一個族群內部也經常形成許多次群體，互相爭論到底誰對本族群的「過去」有詮釋權。

以上的研究在考古學上強調生態考古的重要，在歷史學上將文獻史料作為古人的歷史記憶。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對「異例」（anomalies）——矛盾的文獻記載、變遷的考古現象，以及文獻與考古資料間的差異——的分析與詮釋；相信如此能給我們更多的知識，並避免類比法中對於同異的主觀偏見。這樣的歷史研究其最終目的已不是釐清過去所發生的片斷史實，而是探索人類的社會本質——人類如何以「過去」來凝聚、修正其社會結群——及其在人類歷史上的發展。

王明珂

學經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學士(1979)、碩士(1983)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1992)

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1993-迄今)

國立師範大學兼任副教授(1993-96)、國立政治大學兼任副教授(1994-96)、東吳大學兼任副教授(1997-迄今)

明代經學研究的問題

楊晉龍

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助理

明代學術空疏是明亡（一六四四）後多數學者的共識，經學積衰而只承襲宋元人成說毫無特色，更是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以來學者們認定的事實，而顧氏更在《日知錄》中宣稱「明代經學之廢」，從明成祖（朱棣，一三六〇～一四二四）命胡廣（一三七〇～一四一八）等人在永樂十二、十三年（一四一四年十二月廿六日到一四一五年十月七日）編《五經大全》開始，因為這些書全是剽竊抄襲元人的書來欺瞞讀書人的作品，從此以後，所有論到《五經大全》的文章，都以《日知錄》的說法為定論，以為《五經大全》毫無價值。

〈論《詩傳大全》與《詩傳通釋》的差異〉和〈《詩傳大全》來源問題探究〉二文，主要以《詩傳大全》為例，針對這個學界已流行三百多年的《五經大全》「全襲」元人作品的通說，重新加以檢討。根據《日知錄·四書五經大全》一文考證所得，《詩傳大全》「全襲」元代劉瑾的《詩傳通釋》，筆者以顧氏之說為基礎，以實證的統計方式加以檢證分析，把《詩傳大全》「博引諸家之說」（〈凡例〉言）包括：注音（直音和反切）、解釋字詞和名物制度、說明詩旨等近六千條的條文，用來和《詩傳通釋》引錄的條文，逐條加以比對。結果發現兩書條文相同者甚多，但《詩傳大全》的條文，相對於《詩傳通釋》引錄的條文，包括增添、刪除、改字、移位等情形共有一一三五處不同，佔《詩傳大全》引錄條文五